

近代的中国教会与社会关怀

张恒牧师

特别感谢华牧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有机会对社会关怀这个主题进行探讨。我会从近代中国教会的整个发展过程、宏观的看中国教会与社会关怀。先来看三段经文。

创 12: 1-3 节: 1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 “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 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2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我必赐福给你, 叫你的名为大, 你也要叫别人得福。3 为你祝福的, 我必赐福与他; 那咒诅你的, 我必咒诅他, 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但 4: 17 节: 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 圣者所出的令, 好叫世人知道, 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 要将国赐与谁, 就赐与谁, 或立极卑微的人执掌国权。

太 16:18-19 节: 18 我还告诉你, 你是彼得,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 阴间的权柄(原文作“门”), 不能胜过他。19 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 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 在天上也要捆绑; 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释放。

创世纪十二章里包含着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和应许, 同时也隐藏着上帝对整个人类的计划, 即: 救赎计划与国度计划, 教会在扩展神的国时使万族蒙福的计划。

上帝有一套完善的计划体现在整本圣经中, 他是造物的主, 也是护理的主; 是至高者, 在人的国中掌权, 在人类历史中掌权, 也在现今的时代中掌权, 从古至今祂的权柄一直都在。

马太福音十六章记载耶稣与彼得的对话, 讲到教会的根基建造在磐石上; 教会的权柄能胜过阴间和死亡; 教会有天国的钥匙可以扩展神的国。神有祂的主权和计划, 人有所应该担负的责任, 无论是在福音的广传, 国度的扩展, 还是在社会关怀等所有的事上我们都有当尽的责任。所以今天我们就中国教会七十年的发展过程, 来看中国教会与社会关怀。

在世俗社会人的眼中, 基督教在西方社会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承担着举足轻重的社会责任。他们从基督信仰而来的价值观, 深深的影响着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科技、教育、道德等方方面面, 而基督教在中国当今的社会中, 几乎没有发挥出重要的作用。在过去的七十年间, 基督教在中国经历了: 三自运动, 十年动乱, 改革开放, 和城市化进程。在各种环境的历练之下, 中国教会也经历了快速的增长, 由四九年之前的七百万信徒, 加增到今天超过七千万的信徒, 带来了教会在人数上的百倍增长。然而, 这拥有超过七千万庞大的基督信仰团体, 对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是微乎其微。这种现象不能不令我们担忧, 不能不令我们对教会自身的状态进行神学及处境化的反思, 从中找出真正的原因, 从而进行有效的调整, 使教会不仅在内部进行崇拜、团契和教导, 而且也能在社会中发挥宣传福音和社会关怀的功能。

下面让我们从中国教会所经历的四个阶段, 来思考这个话题。

第一阶段: 建国之后的中国教会与社会关怀, 1949 年—1965 年

建国之前的中国教会实质上大都是西方的宣教士在带领、牧养, 中国教会的牧者基本上是做助手, 只有少部分的牧者像自立会中有中国教会的传道人在影响着教会。49 年神允许一个重大历

史事件发生，改变了中国历史，也迫使中国教会经历一场大的考验。首先它要面对一个新的政权，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其次也要适应与西方宣教士脱离关系，独立的成长，无论是在信仰上，还是在教会的服事上，包括经济的支持上，都要开始学习自立。接下来要接受从政府而来的挑战，政府新的政策对教会本身的存在产生极大的威胁和挑战。最后，如何使自己的信仰面对新环境的挑战，保持不偏离，保持健康，这需要一个处境化的转型过程。另教会要学习在信仰上不靠宣教士、不靠政府，而是要单单的依靠上帝。

(一) 1949年—1965年的社会环境，任何国家的教会存在，跟社会环境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建国初期，经历了三次的大规模政治运动：土地改革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抗美援朝运动。1950年至1952年土地改革运动，这期间教会的土地被没收；1950年到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跟国外机构和宗派密切联系的中国传道人受到严重的逼迫，西方的宣教士被赶走。1950年到1953年抗美援朝运动，国内大力的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宣传，教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这种爱国主义教育宣传让教会会有机会参与社会。比如耶稣家庭，它是自立的教会，成立于三自之前，与三自没有关系，经过爱国教育之后，当年的耶稣家庭把年轻人大批的送去参军，参加抗美援朝。那个时候教会还有机会参与社会，却是非常有限的，而且是在政府的管辖之下参与的。

这三次政治运动不仅带来社会的灾难，也使教会的信徒，传道人的信仰，教会的生存权利遭到一个严重的破坏。当时对教会逼迫最严重的是55年“肃反运动”，政府高层因丧失安全感，就发动了一场针对全社会的运动。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从1955年7月持续到1960年9月；中共中央要肃清内部反革命分子，涉及面广、被清洗人员多，持续时间长，对中国当代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社会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中国教会大批的传道人和信徒在这场运动中遭到迫害。1955年9月14日，广州大馬站福音会堂的林献羔、王国显、张耀生亦被指为王明道分子“大馬站反革命集团”头目被捕，1957年获释。1958年5月30日，林献羔因坚持不愿加入三自，二次被捕，被判20年徒刑。这期间好多的老前辈有被抓的：1958年4月19日袁相忱被捕入狱。1956年5月28日，谢模善因不参加三自在上海遭到逮捕。1955年8月8日王明道夫妻第一次被捕，一年后获得释放。1958年4月29日，王明道、刘景文夫妇再次被捕入狱。1951年11月，赵西门被逮捕，被判刑20年。1952年4月（三反五反运动中）倪柝声被秘密逮捕关押在东北，直到4年后的1956年（在肃反运动中），才与在那一年1月29日被捕的同工汪佩真、李渊如、张愚之、蓝志一等人一同在上海，被作为“倪柝声反革命集团案”公开控诉。1972年6月1日凌晨，倪柝声在安徽省广德县白茅岭监狱（属于上海市管理）逝世。

(二) 1949年—1965年的宗教政策。建国初期政府为了稳定局势确立了宗教信仰自由的基本政策：(1)政协通过了“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权”：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其中第五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权。”(2)人大通过了“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政府制定的政策上是自由的，操作上却试图改造，透过三自革新、控诉、肃反运动等争取到对教会的掌控权，赶走海外宣教士，对教会进行思想改造，把顺服的放

进三自体系中，把心存异见的传道人关进监狱中，同时也导致大批的传道人流亡国外。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在实施中大打折扣，这其中的因素有很多，有无神论的因素，有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观的因素等等。从中央到地方对宗教实际上是宽容也是对立的态度，当时政府提出了宗教的五性论，长期性，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把这个作为对宗教的一个认识。1960年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有人曾极力贬低或反对宗教“五性论”；而代之以宗教的“麻醉性”、“欺骗性”、“消极性”、“反动性”、“排他性”作为宗教的“本质”特征，这从本质上改变了对宗教的态度。1963年文革之前统战部和宗教局也成为左派攻击的对象，称他们掩盖宗教，为宗教说话。1963年8月，国务院宗教局召集全国性宗教团体开会，提出要以阶级斗争的观点认识问题，号召“要揭开宗教掩盖下的阶级斗争盖子”。1964年5月，主管宗教工作的中央统战部被点名批判，其罪名是“向资产阶级投降”；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遭到猛烈批判，其罪名是“维护宗教势力，攻击党对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

（三）1949年—1965年的信仰传承，这期间对中国教会产生巨大影响的是倪柝声，王明道，吴耀宗等人。倪柝声，受莫委拉弟兄会神学思想的影响，注重信徒内在生命的建造，反对传统的宗教形式和仪文，把早期福音的性质转为追求属灵生命的经历，建立以得救信徒为本的教会团体，他注重属灵人过属灵的生活。倪柝声曾经开过一个生化药厂，目的是想在艰难的环境当中脱离西方差会对传道人的支持，自己赚钱支持传道人。但当时他的教会和同工在上海竭力的反对，甚至后来开除了他，好几年他都没有讲道。几年之后他做出详细的解释，大家才重新接纳他。王明道，受基要派神学思想的影响，持守基要信仰、护教、不与世俗联合，认为信徒唯一的要务是传福音，不应浪费时间在文化与社会建设上。有人称倪柝声是使徒，开拓建立了一个本土的、与西方宗派没关系的中国教会系统；而王明道是先知，在斥责罪恶，斥责假师傅，假传道，异端等方面发挥了非常大的功能。这也是基要派在反对自由派的过程中，他们所持守的神学立场，对社会参与及关怀，这方面的一个排斥和忽略。当时持时代论神学思想立场的牧者，对社会关怀也不是很投入，这些都深深的影响着当时的中国教会。另一个具有影响力的人是吴耀宗，他受自由派神学思想的影响，神学博士毕业于纽约自由派神学院，在青年会里面任职。这期间极力推动三自运动，淡化基督教基要信仰，与社会政治文化融合，是三自运动的重要推手。其他各宗派的传道人大都加入了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不加入的都受到打击和排斥。受基要派、自由派、灵恩运动影响的中国传道人，有些持守信仰不加入三自，有些持守不住信仰立场的就加入了三自，不过由于面对当时的大环境的压力，的确不是谁都能扛得住的。

（四）1949年—1956年的教会状况。当时的基督教协进会的吴耀宗与刘良模等人，把全国各地几百件违背信仰自由政策，对教会伤害的案例调查出来，递交北京找领导谈这个事情。在座谈会中，周恩来说现在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而是要明确教会本身的立场问题？中国教会到底能不能跟帝国主义的西方教会割断关系，建立属于中国自己的爱国的宗教组织。这让吴耀宗很无奈的放下了去北京的目的，开始策划三自革新运动，经过三次跟周恩来的见面谈话，最后终于由吴耀宗、刘良模等人在50年9月23日发表三自革新宣言。12月31日签名人数达到78596人；51年4月签名人数达18万；53年12月签名人数达40万。他们签字同意三自革新运动、愿意加入三自的人超过了当时教会信徒的三分之二。这次三自运动促使中国教会彻底的转型，不过是在政府的宗教政策、政治压力和自由派神学思想者的推动下，促进教会进行转型，这不是一次成功

的转型，是一次很失败的转型。这次运动也考验了中国教会传道人和信徒的信仰立场，有些人的信仰根基动摇，有些人持守，有些人受不了逼迫跑到了国外。

另一个促使这么多人愿意签字，同意三自革新的原因，是政府提出来，由吴耀宗等人倡导的教会内控诉运动。中国基督教内的控诉很快的在全国展开，先从教会内部控诉靠宣教士跟西方宗派支持做教会工作的人，控诉西方宣教士，控诉西方宗派差会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据不完全统计，仅 1951 年，中国基督教各团体先后就在全国 137 个城市进行了规模较大的控诉会达 228 次之多。中国教会受到严重的摧残，在社会上的形象受到严重的破坏。51 年初，三千多位西教士离开中国，到 52 年底，大部分外国传教士离开中国。三自爱国运动借着控诉运动，革新宣言，在 54 年 8 月份，正式成立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宗旨是团结、教育全国基督教徒，热爱祖国，遵守国家法令，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坚持自治、自养、自传的原则，办好独立自主的中国基督教会。

于此同时，政府要求教会联合礼拜，以上海为例。上海各区的联合礼拜在 1958 年 9 月 7 日正式举行。50 年上海大小礼拜堂、正式聚会点有二百余所。五年后，吴耀宗透露上海有 140 多个礼拜堂，但到教会联合礼拜后仅留下 23 所，没多久就只剩下 8 所了。在广州，由原来的 52 所教堂合并为 12 所，之后缩减为 4 所，最后变为 1 所，一步步的达到了政府改造教会的目的。实质上这种压缩教会人数，压缩教会信仰生活空间的方式，在 2019 年也用在了河南家庭教会的身上，使家庭教会全部关闭，三自教会大半都合并。这时期的中国教会处在一个受压制的状态，大部分的教会都在尝试适应新的政治环境，应付各种的政治运动，忍受着不同形式的逼迫，无论是认同加入三自的，还是不认同三自的教会和信徒，皆都未能投入社会关怀。

第二阶段：文革时期的中国教会与社会关怀，1966 年-1976 年

1966 年 5 月 16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国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文革浩劫。全党、全国人民一起饱受其苦，宗教界和广大信教群众则更是经受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劫难。

（一）1966 年—1976 年的社会环境。用政府的话讲，党在指导思想上出现了左倾的偏差，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从中央到地方，全社会发生了长达十年的动乱，同时视宗教为“牛鬼蛇神、帝国主义渗透的工具”，党的宗教工作与宗教工作部门被取消。1966 年 8 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陈伯达、江青口口声声要“炮打统战部”这个“修正主义司令部”。不久，宗教工作部门被扣上“执行投降主义、修正主义”的大帽子，被视为“牛鬼蛇神的庇护所和保护伞”，宗教工作干部被斥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统战部门和宗教事务部门受到严重冲击。1969 年 4 月，国务院宗教事务局的干部和在京全国性宗教团体的宗教界人士、职工，除少数几个人留守机关外，统统被下放到干校劳动，宗教事务部门被撤销，宗教工作陷于瘫痪。

（二）1966 年—1976 年的宗教政策。四人帮否认了中央确立的宗教政策。文革期间宗教工作者受到严重的逼迫，对宗教工作者的迫害登峰造极，宗教机构被撤销，宗教工作干部和一些爱国的宗教界人士受到摧残与打击，宗教活动场所被封闭、没收、拆毁。公民完全失去宗教信仰自由，无论是参加“三自爱国会”的，还是不参加爱国会的信徒，都被红卫兵拉出来批斗、游街、

坐牢，有的甚至被活活打死，有形的教会完全被拆毁。用江青的话来说中国的基督教已经被丢进历史的垃圾箱了，要想找基督教的圣经，只能到博物馆里去找。中国大部分地区出现了无宗教区，政府的宗教部门关闭了，教堂也关闭了，中国哪里还有基督徒呢？他们不知道的是教会的根基建造在磐石上，阴间和死亡的权势不能胜过它。

（三）1966—1976 年的信仰传承。文革期间加入三自的传道人和信徒也都受到了严重的逼迫。基要派信徒反思加入三自爱国会后的结局，他们开始由依靠爱国会，讨政府的喜悦，转向依靠上帝，效法基督和属灵前辈的榜样，在逼迫中持守信仰。而自由派信徒开始对基督信仰与政府政策皆都的失望，在逼迫中放弃信仰。

（四）1966—1976 年的教会状况。有形的教堂教会全部关闭，据国务院宗教局 66 年 10 月的那次调查统计，当时有宗教职业者 6151 人，运动中遭批斗的有 1516 人。有形的教会组织被拆散了，但无形的家庭教会仍然存在，这期间河南，浙江，以及偏远地区，仍有信徒在家中、山洞、树林，继续从事小规模信徒聚会活动。

文革的十年动乱期间，信徒连正常的信仰与实践信仰生活的自由都没有，更不用谈教会与信徒对社会的爱心关怀。

第三阶段：改革开放前期的中国教会与社会关怀，1978 年--1999 年

（一）1978—1999 年的社会环境。中国结束了文革，但社会却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邓小平的再次复出，开始进行改革开放，农村分田到户解决了温饱问题。政府出台政策，以城镇化建设拉动农村经济，村民也可以做一些小生意，农民小企业家，小加工厂开始出现。这个期间的政治环境宽松了很多，人可以流动到外地去，农民工进城找工作，很多北方的人到深圳特区打工。为应对开放的需要，宗教自由政策开始逐渐的恢复。1978 年 12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开始全面纠正文革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新中国的宗教工作随之步入拨乱反正的新阶段，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逐渐落实。中央统战部下发了落实政策的意见，1979 年 3 月中央统战部下发《关于做好对宗教界人士落实政策的意见》；《人民日报》也刊登了信仰自由政策；1979 年 9 月 13 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文件《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的方针任务》，强调宗教信仰自由是我们党正确处理群众宗教信仰的一项根本政策。同年 10 月 17 日，《人民日报》刊登题为《全面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文章。这是向全社会发出政府开放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信号，同时也是中国外交关系的一个需要。1979 年，时任美国总统的卡特在会见“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时，卡特总统就宗教问题提出了三个要求：准许中国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准许圣经在中国出版印刷；准许海外宣教士在中国自由传道。邓小平回答说这三个问题让我好好想想，第二天邓小平回应卡特总统说：前两个要求我可以答应，第三个要求不行。邓小平回国之后，兑现了对卡特总统有关宗教信仰自由的承诺。准许教会恢复聚会，允许印圣经，不过海外宣教士不能公开自由的传道，从此就打开了实践信仰自由的门。

1982 年 12 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新宪法，对中国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人民的宗教信仰得到尊重和保护，各宗教团体逐渐恢复，宗教活动场所重新开放，文革时期的冤假错案相继的得到平反。三自爱国会与部分教堂恢复功能；家庭教会

从沿海到内陆的农村快速发展，农民分田到户之后，有大量的时间参与教会聚会和服事。1991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首次提出要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同年5月，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民政部联合印发了《宗教社会团体登记管理实施办法》。1994年1月31日政府发布《国务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和《国务院关于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这意味着政府开始依靠这些条例对国内的宗教活动进行管理。

（三）1978—1999年的信仰传承，以河南教会为例，河南标志性的三个大型家庭教会团队有唐河团队，方城团队和重生派的团队。

唐河团队—除了老领袖之外，基本上同工们都是在八零年前后信主，作传道人。前期在信仰与道路上，都是受王明道基要派信仰的影响，读王明道的书，听王明道的见证，在信仰上反对自由派，坚持反对社会福音，坚持不参加三自，坚持走十字架的道路。神学思想受贾玉明时代论的影响，读了很多他的书，当时外国神学书还没有进入中国；传福音方面受宋尚节和内地会戴德生的影响，传福音，开布道会，建立教会；在教会建造方面受倪析声基督徒聚会处的影响，尽可能不要加入有形的组织，反对宗派，追求属灵和敬虔的生活。灵恩方面受敬奠英创建的耶稣家庭中成员的影响，说方言，唱灵歌；有人说河南的灵恩是从西方传过来的，其实不是的，正是从耶稣家庭承传下来，而耶稣家庭是神召会的影响。心志方面是受老一代前辈们为信仰坐监的见证影响，他们也以坐监为荣，立下为主殉道的心志。唐河团队的重点工作是开荒布道，建立教会，合一宣教，团队侍奉，移民宣教，城市植堂，平衡神学，团队型教会的信仰立场，基本上是福音主义。后期唐河团队属于新福音派，思想上也有非常大的开放，特别是在神学思想上把握平衡的原则，对教会内部建建与外展、圣灵与神的话、神的应许与警戒、神的主权与人的责任等，这些方面的平衡把握的相对比较好。

方城团队—很多方面受前辈的影响，与唐河团队大同小异，在神学思想上稍微不同的是前期他们受上海李天恩的影响，因为方城的老前辈高云九和李天恩有亲戚关系。李天恩被释放之后在方城讲道，特别强调了神的应许，就是加尔文的救恩论部分。在这期间温州教会不知受了谁的影响，引起了神学上加尔文主义和亚米念主义的分歧。温州缪志同接受亚米念主义，与李天恩分别在河南方城不同的区域讲这两种神学理念，产生了非常大的冲突，造成了教会的分裂。方城最早分裂出去的是以张蒙恩为首认同加尔文主义，主流教会领袖张荣亮牧师持守亚米念的立场。当时张荣亮也把李天恩和缪志同分别带到河南唐河团队，唐河持两种神学思想的同工开始为此争论，三天之后两派达成和解，既然上帝把这两组经文都放在圣经里，虽然我们不能完全理解也必须接受，从而开始注重神学的平衡性。

重生团队—比前两个团队出现的更早，信仰与传道方面受宋尚节的影响，高举十架救恩，注重重生凭证；强调十架道路，坚持不加入三自教会，受王明道的影响；建造教会受倪析声的影响。重生派重点强调生命会与真理会，它的七条大纲是十架救恩；十架道路；识透淫妇；建造教会；供应信息；联络交通；开荒布道。这七条大纲凝聚了重生派，主要是在真理会中讲这七步信息，后来他们生命的信息冲击了很多教会，在社会上造成了不好的影响，被政府定为邪教进行打击。

（四）1978—1999年的教会状况。1980年三自会发表《告全国书》，丁光训说：“三自成就巨大，三自任务未了，教会不但要自办而且要办好，三自爱国会恢复职能，教堂开始恢复聚会。三

自运动三十年来成绩巨大，由于这个运动越来越多的中国基督徒热爱祖国了，民族自尊心大大提高了，和祖国人民想到一起、走到一起了。由于这个运动，中国基督教再也不是帝国主义或任何其他反动势力利用的工具，而是已经真正成为我国的一部分公民所信仰的宗教。由于这个运动，我国越来越多的人民和干部改变了对基督教的想法，看到它不再是一个使人不爱国的洋教，已是一个由中国信徒自治、自养、自传的宗教。”

当时的家庭教会坚持不参加三自，回到了使徒时代。农村各地的家庭教会如雨后春笋般兴起。但是呼喊派太过于外显，被人举报，政府借着综合治理打击了呼喊派，同时也打击了全国的教会。在这个打击运动当中，有些传道人被抓，有些外出全职奉献，这些人在患难中走到了一起，农村团队型的教会开始兴起，我们的团队就是在这期间建立起来的。83年之后每年的综合治理，都会打击社会不安全因素，其中就包括家庭教会，很多人在严打中被抓，家庭被罚款、抄家等。改革开放之后老一辈的传道人刑期已满释放出狱，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南林北袁两盏灯台。北京袁相忱建立家庭聚会产生了很正面的影响；广州林献羔的大马镇聚会也成为一盏灯台，为主做见证。这两盏灯台影响了全国的家庭教会，坚固了各地教会的信心，虽然受到逼迫，仍然坚持聚会。团队型的教会开始差派工人到各地建立教会，建立团队，同时政府也开始以邪教的名义打击家庭教会。1996年唐河团队被定为邪教全面打击，因为建立有差会，差派工人的动作大，引起政府关注，传道人大批的被抓坐监。河南三大团队的传道人经常会在监狱里见面，在外面很少有联系，监狱里却有很好的信仰交通。1996年赵天恩牧师在国内联络家庭教会，推动教会合一，1999年底，在北京组织几大团队的人一起书写《中国家庭教会信仰告白》（本人也在场）及《我们为什么不加入三自？借此表明家庭教会的信仰立场，及不加入三自的原因。这期间农村团队型教会开始把福音的重点转进城市，在城市传福音，建立教会，但是依然是不愿意参与社会。例如：农村教会禁止人出去打工，更不用说从事社会公益，只是强调信徒要有好行为和走十字架道路，要以好行为来影响社会。农村团队型教会工作的重点是传福音，建立教会，追求个人成圣，为主福音受苦，坚持走十架道路，用个人好行为影响社会。个别的家庭教会，会在本地作一些公益性的活动，如修路、修桥、栽树，带来基督信仰在部分地区的见证。但整体的中国教会对社会关怀是没有概念的，不愿意投入，没有力量投入，也没有机会投入。

第四阶段：改革开放中期的中国教会与社会关怀，2000年---2019年

（一）2000年—2019年的社会环境。这期间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使大量的农民进入城市；中国成功加入世贸组织，带来经济发展；成功申请举办奥运会，使社会环境宽松；中国的宪法修改以及与美国发生贸易战，这些都对教会产生直接的正面与负面的影响。

（二）2000年—2019年的宗教政策，政府提倡宗教在经济与和谐方面发挥积极作用。2001年底，江泽民指出：“宗教走向最终消亡可能比阶级、国家的消亡还要久远。既然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要长期存在，我们就要对宗教事务进行科学的管理。这种管理，既要有利于抑制宗教中的消极因素，又要有利于发挥宗教中的积极因素。”2006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加强信教群众同不信教群众、信仰不同宗教群众的团结，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2017年新的《宗教事务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发出。2018年1月正式实行新的《宗教事务管理条例》带来宗教生存环境的改变。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

告要求“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十七大通过的新《党章》在党史上首次提及宗教：“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团结信教群众为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

于此同时，政府在操作方面采取对外严防、对内放宽的政策，对家庭教会的逼迫明显减少，默许家庭教会在公共领域中聚会。相关人员主动与家庭教会的牧者沟通，在一定的范围内政府默许教会参与社会关怀、救灾、慈善、献血、社区服务等。但这并不等于城市教会在发展的过程中没有逼迫。2010-2011年北京守望教会、上海万邦教会及其他一些教会相继取缔。2015-2016年浙江省以三改一拆之名义，拆掉教堂的十字架；同时，北京政府安排人约见家庭教会领袖，表明对三自失望，对家庭教会有期待。2017-2018年河南政府拆除教堂十字架，关闭家庭聚会，合并三自教堂。2018-2019年全国教会受逼迫，北京锡安教会、成都秋雨圣约教会、郑州谷穗教会等众多教会被强行关闭。国旗、国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教堂，对教会再次进行改造等。

（三）2000年—2019年的信仰传承。这二十年间，中国教会从农村逐渐走进了城市，出现了大量的城市教会，他们受属灵前辈和团队型教会的影响，持守家庭教会的立场，坚持不加入三自，热心传福音，建立教会。韩国教会也差派大批宣教士到中国训练传道人，帮助建立教会，城市家庭教会尝试走大型教会的路线，上千人的教会在上海、北京等城市被建立起来。海外宣教士以不同的身份在各地传福音，帮助建立教会，资助中国传道人去西方留学接受神学教育，西方的神学思想被带了进来，开始效法西方教会的模式。留学生受西方宗派的影响，在国内倡导改革宗，浸信会，灵恩运动等等。这期间城市教会的信仰传承相对比较复杂，但是它的信仰立场基本上是福音主义。

（四）1999-2019年的教会状况。教会开始建立组织，拟定章程，建立教会联接，参加了著名的洛桑大会，同时在改革宗，灵恩，公共神学方面进行神学思考。开办不同规模的神学院，派传道人到西方进修。此时社会中一批律师进入教会为不法的事情发声，带来政府对教会新的看法。另一方面城市教会开始推动植堂和宣教运动。他们把家庭聚会放在公共领域的办公楼聚会，转型成堂会，或者是差派人到其他地方植新堂，推广宣教中国 2030 的福音运动。值得欣慰的是，家庭教会在社会公益方面开始觉醒，自 2008 汶川大地震，中国基督徒爱心行动参与救灾和灾后重建以来，中国部分地区的教会开始觉醒以基督徒专业人士，或注册 NGO 的方式，投入社会关怀。城市教牧联祷会为灾区捐款、捐物，基督徒促进会帮助策划公益项目，主内基金会帮助项目筹集资金，慈善服务机构进行各种社会服务，主内律师、学者为社会不公正的事发声等。2020 年新冠病毒疫情发生时，中国不少地区的教会群体和个人、城市教牧联导会、团队型的教会，基督徒的 NGO 组织都积极行动起来为武汉及不同国家进行爱心捐助，但还有一大部分的教会牧者没有关怀社会的意识。

综上所述，中国教会对社会关怀反应迟钝是由很多因素造成的，包括宗派传统，不同时期的宗教政策、神学思想、社会环境，还有教会本身的不成熟，认识上的片面性，教会发展的方向和事工上的不平衡，又由于教会处在一个成长阶段，重点在维护教会自身内部的建造和发展，就是宣教也仅仅是一个异像，对于社会关怀的重要性更没有足够的认识。总的来说中国教会整体的性格是内向的，对于外向的社会关怀是忽略的。因此，我们必须根据圣经和当前处境，进行深入

的神学反思，使中国教会在神学认识及实践上更加的成熟、完善，不但尽心爱上帝，也要爱邻舍如同自己，不但推动宣教，也要投入社会关怀，使上帝因教会得荣耀。愿上帝赐福各位！

讨论时间：

Q: 您刚才从四大历史阶段回顾了教会发展的七十年的历史，那现在您认为教会是到了一个关键时刻来比较全面的思考与社会关系的问题吗？

A: 从政府和学者的角度来讲，他们对中国教会有些失望，也有些期待；从圣经神学的角度来讲，教会应该做社会关怀。教会本身的功能如敬拜，团契，教育，宣教/布道与服务等，大家都热心投入。而社会关怀，社会服事却被教会忽略，我觉得应该补上这块，这样这个身体的功能才会健全。从目前教会的生存环境来看，有机会可以参与，也能带来更正面的影响，如果教会只顾自己内部的建造，将会产生很大的问题。

Q: 我们这边的教会会同时向政府注册两个部分，一个是教会而一个是基金会，我们主动地向本地的政府，法院，移民局及附近的公共学校，报告我们有资源可以提供帮助，如提供学中文服务，给移民局做义工翻译等，这是海外的教会通过基金会主动做社会关怀上的事情，这个星期大家捐了大量的油、大米分给疫情期间受灾的民众，有些新闻记者，政府机关公开发新闻报道了这件事。我想问张牧师，在中国，如果教会成立一些基金会主动为政府提供帮助的空间有多少？教会有什么样的资源能够主动为政府提供帮助？

A: 从汶川地震之后中国基督徒爱心行动在教内教外的影响来看，教会还是有机会参与社会公益。09 年之后政府实际上允许民间申请成立一些公益组织，比较前卫的教会已经申请了基金会或者服务中心。这些国内的 NGO 这些年做了很多社会公益方面的事情，多是教会中的人参与。我在跟他们沟通的时候他们提到说，他们是教会内部的边缘人士，被很多人不认同不接纳。现在一些牧者意识到这个的重要性，大力的支持他们了。我自己也成立了一个非盈利机构，教会透过这个平台做了一些社会公益方面的事情，政府也没有过多的干预我们的爱心行动。由此看来教会还是可以通过公益组织来进行社会参与。政府对社区管得比较严，如果没有一个合法的身份，基督徒不太容易进入社区，我们需要这个身份让教会的人投入社区。教会把资源投入这个平台，可以通过在这个平台影响社会，服事社会。